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十七）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回忆文章“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标题为编者所起。作者张元勋，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54级学生。1957年因主编学生刊物《广场

》被划为“极右派”，于当年1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其恋人、同系同年级新闻专业女学生林昭，原名彭令昭，因为拒绝与张划清界线，也被划为“右派”。后于六十年代初又上书当局表达不同政见，遂在家乡苏州被捕，于文革高潮的1968年在上海被枪决，时年三十六岁。这里节选的部分记述张于1965年底刑满后前往上海监狱探望林昭及后来发生的事情。

】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1965年似不能算是“四人帮”时代，原文如此——编者按）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入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经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加上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病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名义上的亲属，但唯此一计，别无妙策，后许先生信告：“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他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阔别九载的青岛，（我自1956年寒假毕，开学赴北大，1957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份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未休，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地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的中学里，与我同步地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与词的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唯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也是枉然！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呕哑嘲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

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着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唯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它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 她就是在监狱，我也要见到她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份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刘少奇前妻之一——编者注）。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谁知乃是永诀！并合影留念。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生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其处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达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说：他们定在6号！

◇ 她头顶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成一个“冤”字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幡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连椅及一张长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连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连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连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长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稍待，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稍待，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几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连

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稍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连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起来，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的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我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

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象，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肉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么？”“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物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焊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个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蓝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场，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简短地切切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

“蓝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个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

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走边说，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洒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睹！（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X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当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X处长请教：“报告X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份子鸣不平！”X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

头”图案却无处寻觅。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 “是谁杀了我的儿？我的儿是谁杀了？”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们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也许还要辱尸）的全部过程。祥祥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痴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矜，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朦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的游荡！她念念有辞。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

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的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支裂人心肺

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浮、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槁枯，她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而去！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海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体落在何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们真诚地请求你发一次善心，就请你写一封匿名信，请寄往“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管理处”吧！为我们提供寻找林昭遗骨的线索与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德！苍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与一切神灵都会呵护你“立地成佛”的！

□ 节选自北京《今日名流》2000年2月号

~~~~~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陈伯达垮台前后（二之一）

• 汪东兴 •

【编者按：上期通讯（zk0005b）中“透过历史的迷障——解读《陈伯达遗稿》”（胡平）一文引用陈伯达对1970年庐山会议上导致自己垮台的那个发言的自述：“小组把我说的，也有别人说的，作成了简报，对所指的人没有言明，但措辞尖锐”。“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像是汪东兴说的”。江青、康生读到华北小组简报，找到毛告状。然后一千人等在毛那里开会，“李雪峰和我虽出席，却是处在被告的地位。那位提出揪出来的，也没有事”。本文为当事人汪东兴对庐山会议的回忆。两文对照阅读，有助于澄清历史真相。】

1970年8月18日下午2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

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毛主席于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题目中用“一点意见”，我看就是针对着林彪这里说的“讲点意见”的。——作者注）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

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一丝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我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

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他说：“是。”

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陈伯达打印的几条语录如下：

##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

##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 “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

2. “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82页

4. 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5.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8月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下午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

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同志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一样内容的书面发言稿。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分，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并且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刷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

8月25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量刊登了出来。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这个简报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

这天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谈完话，时间已到下午2时了，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当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我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8月27日，我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感到第一次的检查还不深刻，认识也是初步的。当时我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我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我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

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主席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还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



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

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2日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在华北组，我按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检讨以后就请假了，没有再去参加会议。

9月4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9月5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

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作者注）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的话。——作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在强调搞好党内外团结的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导演下这些人还在一起照了集体像。这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林彪走后，黄水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这次全会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9月9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因为那天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像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林彪一伙并不甘心这次失败。

（未完待续）

□ 摘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连载之二）

• 常 仁 •

（二）

本文重新梳理文革期间造反派和新老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关系，并非意在对两派作出价值评判。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作审视，两派的存在、动机和所作所为，都自有其客观政治原因和现实依据。光说文革是灾难没有多大意义，关键要搞清这个灾难是怎么发生的，有哪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以什么方式相互作用，把国家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只有把这些问题彻彻底底搞清楚了，防治文革灾难重演的想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现在有几种流行的说法，一是在“一月夺权”之后陷入分裂的造反派，只知道争权夺利打派仗，使文革完全失去了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初始动机和革命性质。二是持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激斗时，并不明白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是什么。他们都是盲目地为着纯洁政权和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而作战，与民众自身的利益毫无关系。（36）三是文革是毫无目的和意义的残酷；一场几亿人自觉投入的历史大事件，就是一个劣质民族兽心发作的大汇总。

根据文革造反派和新保守派之间的实际斗争历史和矛盾焦点来看，上述三点显然都站不住脚。衡量一个组织的政治倾向和性质，当然不能按照其初始面貌而必须以其现行立场为依据。早期冲击“资反路线”的造反历史并不能证明：当时以“四一四思潮”为代表全面转向保守派政治路线的全国各地少数“老造反”组织，仍然具有造反派的性质。而那些先后受到“第二次反右”和“二月镇反”严厉打击的真正造反派组织，为避免被再次“政治清算”的命运，在与由军方支持的新保守派进行（后来演化为“大武斗”）的政治对抗中，能否取得优势地位，可以说跟他们而后的政治命运生死攸关。而他们在这场对抗中最终失败并受到的毁灭性打击，再雄辩不过地证明：他们所作的政治对抗，绝对不是无意义地展览“一个劣质民族的兽心”，而是与其自身的政治安全和利益，性命攸关！

目前有一种新的看法，即文革对精英阶层过于残酷的镇压，客观上催化鼓励了腐败；为右翼思潮的泛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道德依据；使大批“红眼病”、大骂“民粹主义”之类的政治言语，得以畅通无阻；并使鼓吹仇视和压榨平民百姓的反动倒退论调，变成了反“民粹主义”的“进步思想”。这种看法无疑真切地反映了现实情况，但如果把精英阶层在改革开放中的胡作非为和信口雌黄，看作是他们对所受迫害作出的反弹，那么，千千万万在文革中实际上遭受更多灾难和迫害的社会底层造反民众，他们是否也应该作出他们的反弹？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目前思想界回顾总结文革教训的过程中，却绝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差，关键就在于人们看不到在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年右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基因和政治上的某种前后承袭关系。人们在构筑对待文革造反派的否定性看法上，存在着一面肯定五七年老右派的正面地位，一面却仍然沿袭中共反右斗争的思路和眼光，对文革时期的新右派持完全否定的矛盾立场。这种矛盾立场对改革开放事业所造成的不利后果，至少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削弱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和参政意识，助长了官僚特权和腐败风气。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规模腐败，除了现在流行的各种原因分析和理论解

释之外，人们是否应该从如何全面客观分析评介文革的角度，寻找相关的政治原因呢？在此，我们不妨读一下在互联网和有关刊物上摘引到的几个观点：

——现在看到报纸等媒体上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案，我的心已不再诧异和惊讶，毕竟，连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都能那么腐败，当什么省长市长的贪污腐败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去年广东湛江发生的涉及到政府、海关、公安的特大走私案，浙江有十七个反贪局长落了马等等。如果现在还有人说什么只有少数人是贪污腐败的话，除了两三岁的小孩可能相信，恐怕大多数人只当是笑话罢了。

现在看到那些坐着高级进口轿车高高在上的官儿们，那些开着警车横冲直撞的人，我从内心里真的没有办法感到一点点尊敬，说实话，谁能保准他们哪天不露了馅呢。只是每每想到像我这样普通的老百姓的福祉还指望那写道貌岸然的贪官们，还指望他们为人民服务，那真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啊！

不过得说句公道话，贪官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贪官，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谁不会变得越来越贪，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变贪！国法、党章不都写得很漂亮吗？不是有反贪局吗？不是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吗？不是有报纸电视等的舆论监督吗？作为党员的官员不是应该很大公无私很高尚的吗？照说这贪污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应该是没有或极少的啊！可是为什么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不是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得不够呢？显然不是，我们中国可能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最多的了。那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错呢？？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深刻地思考本质的问题，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积极地反对腐败。结果，全中国人民，全社会都深受其害。事实证明，任何时候，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什么事是办得到的！！（37）

——广大人民群众为何没有被动员起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地反对腐败呢？有人是这样看的：“在我看来，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反官僚主义和反腐败的运动。现在大家都忙着否定文革，有人说要开文革纪念馆。可我觉得，最重要的却应该是总结文革的教训，讨论为什么文革会失败？文革不能说是一场浩劫，有人的利益被侵害，但也有得势者，而且得势的是从来就最没资格谈政治的农民和工人。看看现在谁又把这些放在眼里呢？现在政治是政治家的事，经济是经济学家的事，赚钱是商人的事，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又在哪里？”（38）

——不计代价与后果地追逐经济增长，只能使原有种种危机越发严重。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于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以及全社会的腐烂和人的非人化趋向难以容忍，数以千万计的人生存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产生了对文革的怀旧情绪和寻求改变现状的途径，是很自然的。

这时，我们在知识界见到的情况又和八十年代有所不同了。少数文学界“精英”把人们因不满现状而对文革中某些东西有所怀恋的情绪称之为“文革情结”、“文革思路”、“文革语境”等，加以否定；一方面和中共站到一起“彻底否定文革”，同时极力维护现状，说中国现实状况是“非战争状态下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见《读书》1995年7—9月号王蒙等三人对话录）。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对于一切对现状（包括对他们的错误）持批判态度的人，则称之为“红卫兵”。看一看这些人的背景，再想一想国内外另一些“精英”的作为（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全盘肯定甚至提供理论依据，号召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使命感和责任感，声称中国实现民主的条件远未成熟，等等，为这个政权充当谋士、辩护人和说客），就不难发现，一个为中共统治集团保驾护航的知识分子既得利益集团业已形成。

文革本来就不是一个纯历史题目，它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都活生生地在今日中国的现实中运作着。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共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清查“三种人”、邓小平提出（实际上是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和后来从新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时起，中共领导便庇护文革中的罪人，打击文革中新生的健康力量；坚持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错误的东西，用来打击、扼杀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健康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东西——人们的独立精神、批判态度和投身社会变革过程的热望。（39）

——我认为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组，在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群众中抓大大小小的蒯大富式的反革命，这种错误是共产党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所犯的某种错误的继续。这个问题的是非虽大，应该辩论清楚。但这不只是王光美和刘少奇的问题，应该说是中央的问题，甚至包括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份的问题。（40）

尽管上述摘引观点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但是从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中国腐败问题的蔓延，确实跟我们对文革造反派和毛泽东“造反有理”精神的全盘否定不无有关，也与中共第一、第二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后期）沿用反右斗争的传统做法，不断清洗打击民主参与意识较强的造反派知识分子和民众密切相关。

二、放弃对“大民主”的有益尝试和改进完善，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国际敌对势力有可乘之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和与官僚阶层妥协的需要，默许甚至纵容了对造反派的大规模打击迫害，文革运动毕竟创造性地突破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传统与常规。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文革给群众以“四大”（41）的形式，去揭发、批判和斗争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上至中央副主席，下至一个车间支部书记一切党组织领导的权利；而在文革以前，哪怕向一个党员提一丁点儿意见，都可能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反党行为”。文革时中央不再通过中共严密的官僚机器层层下达指示精神，而是通过“两报一刊”等新闻媒介，把方针政策平等地直接交给每一个读者。当各级官员们对重要政治信息资源的垄断一经被打破，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便与中国数千年上智下愚、唯官是从的传统，进行了最为彻底和最具革命性的决裂。他们不再在官僚面前感到自卑，甚至还敢于从制度上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而这正是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构成了实行民主改革的必要精神前提。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是文革造就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对于文革所包含的这种正面意义，怎么肯定都不为过。如果没有在广大民众中，完成这种辛亥革命和一九四九年建国都没有完成的思想革命，而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将会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把吸收这类文革正面因素看作与改革开放对立的观点，毫无道理。

与曾经流行一时的“权力斗争说”相抵触，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毛泽东一经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之后，随即把确保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权利，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和文革最为重要的成果，列入了一九七五年的宪法。宪法不仅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还在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规定。文革造反派以付出千千万万人鲜血和生命的巨大代价，终于使人民得到了的这种不受任何经济条件限制（只要买得起笔、纸和浆糊）的言论自由以及对当权者滥用职权、营私腐败进行批判斗争的自由和权利。如果说，在文革这样空前的民族灾难中，确实包含了某些正面的因素，除了上述民众民主精神和独立思考意识的苏醒，这些宪法规定就是另一个象征。

就如任何一种新生的民主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某种缺陷一样，“四大”在

实际运用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考虑到即使非常成熟的西方普选制度，也会给希特勒上台提供条件，“四大”可以被野心家、阴谋家所操纵利用的事实，不应该构成废弃这一制度的理由。不是从改进、完善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立场出发，而是“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轻率做法，随着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越演越烈和不可遏制之势，其负面影响正在越来越清楚地不断暴露和显示出来。

请试想：如果曾经在改革初期把大贪污犯王守信揭露于世的“四大”武器，作为一种制约腐败的群众性民主监督制度，仍然正常运作并发挥其令人生畏的威慑功能，如果毛泽东所提倡的“造反有理”精神，仍然以普遍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在社会各个方面对腐败分子经常性、微调性地发挥遏制作用，并由此对权力构成某种社会性、机制性的“生态平衡”，引发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的种种社会弊端，也许根本就无法形成；至少不可能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以至最后汇集到一起，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震荡效应。西方敌对势力挑唆煽动青年学生闹事的那套伎俩，有关惟有实行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制衡“权力腐败”的欺骗宣传，就不可能获得广泛的思想市场。把那场政治风波归结于文革余毒没有肃清的说法，实在是颠倒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

注释：

〔36〕王山《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第113页。

〔37〕“与网友的通信交流”《探索与争鸣》，强国论坛2000-02-20。

〔38〕箫羽“我眼中的文革”《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2000-01-31。

〔39〕齐全德“文革为什么成为禁区？”《大路》月刊第三卷第四期1996年4月15日。

〔40〕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九三期（文革博物馆专集·五十五）。

〔41〕文革时人民群众所运用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未完待续）

□ 寄自加拿大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晓峰（加拿大）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边（芬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波（美国）	<cnd-cm@cnd.org>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 或 gb-uu 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 服务站地址：[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ftp://cnd.org)[142.132.1.13]: pub/cnd/hxwz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